

中国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
论文汇编
(四)



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

中国近代军事史

060

学术讨论会论文

中国近代战争的战略格局

与政治的关系（1840—191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朱 宗 震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中国近代战争的战略格局

与政治的关系（1840—1919年）

朱宗震

战略问题，是关系战争全局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①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对战略思想、战略格局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克劳塞维茨曾强调指出：“对一个大规模战争事件，或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能容许的，甚至是有害的。”^②因此，研究政治对战略思想、战略方针、战略格局的影响，是战争史和战略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在中国近代史上（本文以1840—1919年为限），按战争的政治性质区分，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反侵略战争，二是反革命战争，三是革命战争。由于战争的政治性质不同，三类战争所形成的战略格局也各各不同，而历次战争，以及战争的不同阶段，也因为政治因素纷繁复杂的变化，而使战略格局产生相应的变化。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68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②《战争论》中译本第三卷第897—898页，商务印书馆版。

本文仅就近代史上一些主要战争的战略格局与政治的关系，作一粗浅的分析，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

一、反侵略战争中的战略格局与政治的关系

反抗列强侵略的战争，是中国近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次战争中，尽管敌国不一，敌情多变，具体的军事形势也各不相同，但是，在面临列强侵略的时候，清廷作为中国最高的军政当局，总是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被敌军所迫，被动地形成临时动员、和战不定、局部抵抗、消极防御的战略态势，结果损兵折将，失地求和。

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廷在英国侵略者的战争威胁面前，害怕“边衅一开，兵结莫释”，①因面希望以妥协求和平。面当侵略者的无理要求难以接受时，清廷又企图“伸天讨而示国威”（勿促调兵遣将，泛令沿海省份备战。在战争的间歇时期，清廷又幻想和平，一再命令沿海省区“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③这种和战不定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战争动员和士气。实际上，真正备战的军队和地区极少，只有在局部地区才能组织抵抗，当然给机动能力很强的敌人以可乘之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廷对京师门户大沽口的战备措施也时紧时松。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时候，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第32页。

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第93页。

③同上，第110页。

清廷同样地陷入和战不定的泥淖之中，战争动员既迟又慢。而且，在历次战争中，清廷面临强敌，根本没有对国民进行全国总动员，这就必然造成战略被动。

中国封建统治的政局是造成这种战略被动的根本原因。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进入中后期，统治阶级的上层日趋腐朽，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地主阶级上下层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也扩大了。因此，中国所从事的对外战争在政治上具有如下的二重性：一方面，中国是进行保卫国家反抗侵略的战争，因而战争具有正义性，在战争过程中，中国为了生存，必将取得进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因而战争具有落后性和保守性，甚至具有反动性。（如清廷因仇视维新变法而排外）一方面，在列强侵略面前，朝野上下有着强热的爱国主义要求，而清廷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统治者的权威，为了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统治秩序，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渗透，也不能不从事战争；另一方面，清廷又害怕进行对外战争。中国封建统治者面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形势，总是安内重于攘外，十分顾虑对外战争对国内政局的影响。一方面，清廷及其维护的大地主阶级政治集团，文恬武嬉，既没有组织战争的能力，也不愿意承受战争的牺牲；另一方面，地主阶级爱国主义者虽然有一定的战争组织能力和自我牺牲精神，但他们没有能力在改革中国政治的基础上主持反侵略战争。因此，随着大地主阶级爱国主义精神日趋式微，清廷总是希望以妥协

求和平，幻想用较少的代价来满足侵略者的要求，以避免战争的爆发，或者尽量压缩战争的时间、规模和范围，从无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正是这种局面，造成清廷战略上的动摇性和保守性。

当然，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统治阶级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派别之间，是有区别的。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中国闭关自守，外强中干的局面尚未打破。清廷尚抱有把侵略者驱逐出境的战略意图。然而，清廷在实施战略部署时，却十分腐败保守。清廷任命腐朽无能的满族亲贵担任前线指挥，脱离人民的战争动员，使得清廷不能不远离从内地省份向沿海战区调兵，清廷所动用的八旗、绿营等建制兵种，军纪败坏，战斗力十分薄弱，它在内线作战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在满族亲贵眼里，“防民甚于防寇”。^①加以将不知兵，指挥系统十分凌乱。而且，当时用冷兵器为主的中国军队，运用什么战术来对抗用火器武装起来的外国侵略军，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然而清军将帅对此懵然无知，没有任何适应敌情的应变部署。因此，即使有一些军队是勇敢战斗的，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镇江守军，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八里桥战斗中的蒙古旗兵，但落后的战术使他们一败涂地。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第100页。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军队在国内战争进行了整组，湘、淮军的战斗力超过了八旗、绿营，尤其是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在与列强在华势力合作过程中，配备了洋枪洋炮。以李鸿章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洋务派，开始着手经营国家资本主义，向着官僚资产阶级的方向转化。尽管如此，李鸿章却更加滋长起失败主义的情绪。左宗棠曾枪评李说：“伯相（指李——引者）擅淮军自雄久矣，既谓天下精兵无过淮军，又谓淮军不敌岛族（指列强——引者），是天下古今有泰西无中国矣。”① 李鸿章与盲目排外的纯粹的封建性集团不同，他经办洋务的结果，比较多地了解了西方。因此，他看到了中外实力的差距，看到了中国政治的腐败，军制的落后和紊乱。他深感宫廷奢靡，不顾民生，纪纲日弛，“踵此西行，乱机将光”，② 西国家亟需的海军建设，进展迟缓，“悬想海上战争，辄用危心”。③ 然而，李鸿章推行的有限度的改革也阻力重重，难以实施，他为了既得利益只能因循苟且，“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④ 何况，国家资本主义的买办化倾向，使他和列强之间建立起了共同的利害关系。这样，从战略角度，李鸿章当然看不到战胜列强的可能和希冀。

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58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14页。

③同上，卷17，第31页。

④《能静居日记》光绪元年九月初二条。

因此，李鸿章作为实际掌握兵权的主要统帅，他在战略指挥上，可以说只是“陈兵求和”。他组织有限度的防御阵势，不是为了战略决战，也不追求战役的胜利，而是为了和敌军讨价还价，以求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和的。中法战争期间，李就认为：“如法兵犯我驻守之地，不能不与开仗……第念开仗以后，我胜则法必添兵再战，我败则尚可退回本境……届时再徐议分界划守。”^① 而在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时，李拒绝向前线增兵，认为“我再多调，日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② 他不抱有战胜列强的幻想，甘于接受战败求和的必然结局。随着大地主阶级向官僚资产阶级转化的程度加深，他们反侵略的战斗意志也越来越薄弱，八国联军入侵时，大地主阶级的顽固派，还想依靠义和团的“神术”抵抗列强，而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著名的洋务派封疆大吏公然拒绝和列强开战，相反，他们与列强达成了“东南互保”，用镇压群众反帝斗争，来维护买办利益。

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主战派，他们同基层地主的联系比较密切，反映基层地主阶级积极抗战的要求。因此，他们的战略方针，是依靠地主阶级的基层组织，进行战争动员，从改造军队着手，部署抵抗列强侵略的战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

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5，第8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第49页。

徐就组织团练，招募水勇，抵抗英军。左宗棠以在野之士，提出战略设想：“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划疆为守。”^① 这种战略方针加强战争动员的广泛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弥补了内地调兵的不足，利用庞大国土和人力优势以抵消英军的火器优势和机动能力。但是，腐败无能的大地主阶级的政治——军事代表，不可能接受这种战略方针。

湘、淮军队是基层地主阶级在对抗农民革命中发层起来的，其中的一些将领如左宗棠、张树声等人，在出任封疆后仍和基层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中法战争期间，中国军队中有一些战斗力较强的武装力量。这些主战派能够依托基层组织抵抗，他们强调重用黑旗军，在关键时刻起用正在组织团练武装的冯子材，协调前敌各军，从而赢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

当然不应该过高估价林—左战略思想的意义。由于整个地主阶级都在趋于没落，清廷日趋腐朽的局面无可改变，地主阶级的爱国主义正在让位于资产阶级革命爱国主义。也就是说，只有革命改造中国，才有可能战胜列强。所以，依托地主阶级基层组织的战略方针，只能在少数战役中暂时发挥一些作用，不可能从根本上战胜列强。左宗棠曾经规划“以务本而自致富强”，^② 即从加强地主经济着手，从而使得“民心定，民力纾，官司有所恃以为固，更得精

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第11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第64页。

兵利器以辅之，自可销奸慝之萌，折骄寇之焰。”^① 这样一种安内攘外、战胜列强侵略的大战略观念，仍然是十分落后、保守的观念，而在事实上也行不通，只能是一种盲目的幻想。

群众性的反侵略战争，在庚子以前的历次对外战争中，还缺乏起码的组织性，也不具有战略意义，并且，基本上没有超出地主阶级所能控制的范围。鸦片战争时三元里的抗英斗争，组织十分松散，所谓“富者出钱，贫者出力”^②的反侵略武装，乡绅地主总是处于领导地位。中法战争时，黑旗军里然是由农村暴动中发展而来的，但它的反侵略斗争，总的说来是在地主阶级的控制之下进行的。不过，在这些组织中，农民群众是积极的参加者。义和团运动则有所不同，义和团是以农村暴动的方式进行反抗列强在华势力和军事侵略的斗争，它的组织性也比过去加强。义和团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地主阶级的影响和控制，但地主阶级显然已经掌握不住农村暴动的方向了，所以，最后只能加以残酷镇压。

义和团以群众暴动的方式反抗列强侵略，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件。它虽然没有也不可能代替清军成为抵抗八国联军的主力，但它表明，农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反侵略的积极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它表明农民才是中国社会反抗列强侵略的主力军。问题是要有一个先进的政治领导力量，把这股巨大的能量引导到正确的轨道。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0，第12页。

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第16页。

二、反革命战争中的战略格局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国内的反革命战争，主要是镇压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两大类。由于战争的阶级关系、政治性质不同，形成的战略格局也各不相同。

地主阶级和革命农民之间，在政治上极端对立，双方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而资产阶级革命所处的政治环境比较复杂，在执政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还有一些中间性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治派系，政治上互相渗透，有妥协的余地。因此，前者在战争中两军壁垒森严，战争表现为长期性和绝对性；而后者，则随政治——军事同盟关系的组合变化而变化，战争表现为间断性和妥协性。在战略上，镇压农民革命采取了全面围剿的方针，而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则采取战略压力、重点透攻、政治瓦解（依靠政治收买和政治欺骗）交互使用的方针。在战争形态上，前者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战略形势由于战争规模庞大和长期化而起伏多变，而后者除街垒战斗外，则以阵地攻防战为主，战争规模和形态都比较简单。

在上述两类战争中，战略方针和战略格局还随主持战争的政治派系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当太平军初起的时候，清朝在各地兵备空虚，而统治阶级的上层，由于长期养尊处优，缺乏应变的能力和准备。然而，清廷为维护既成

的政治秩序起见，在战略上急于求成，企图把农民革命扑灭于萌芽状态。因此，清廷依然把希望寄托在原有的建制兵种——八旗、绿营，以及临时募集的游民成份为主的勇团之上，并且，让满族亲贵统率，以便“聚集精兵全力攻剿”①。其实，清廷这时已经没有精兵良将可供调遣，它部署前敌各军尾追、拦截、兜剿，迅速扑灭太平军的战略方针，总是捉襟见肘，被太平军所粉碎。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后，它一次次组建江南、江北大营，期望一举攻克计划，也一次比一次失败得更惨。曾国藩检讨清廷战略的失算时说：“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皆督军由京南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②

这样，清廷原有的政治——军事势力，逐步地被太平军所消灭，在太平军所到之处，清朝的统治出现了空虚状态，这就为地主阶级内部政治关系的改组，为湘、淮系政治——军事集团的崛起开辟了道路。而清廷也不能不改变自己原来的政治方针，依赖湘、淮集团来收拾残局。

清军战略方针的政变和战略态势的改善，实际上是从政治上的变化开始的。左宗棠认为：“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

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4页。

由于人才不出。”① 所谓“人才不出”，实际上是大地主阶级对政权的操纵，形成了与基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隔阂。所以，左宗棠又感叹“公卿不下士久矣”。② 左之从入山避乱到出佐湘幕，就是因为湘抚的再三礼聘打破了这种隔阂。后来，咸丰进一步对左宗棠进行了破格的提拔。曾国藩以一个在籍侍郎奉命举办团练，表明清廷不能不考虑依赖基层地主的支持。然而，曾国藩的活动远远超过了清廷原来所规划的范围，他利用清廷在地方上的统治出现的空虚状态，得以从长计议。从团结基层地主阶级着手，对清朝的政治和军事进行了改革。曾国藩不求速效，强调“以练兵为要务”，即编练有战斗力的军队，他“于省城（长沙——引者）立一大团，择乡民壮健朴实者招募来省”③，予以训练。后来，他根据长江用兵的特点，强调了水师的建设，而“练勇成军者……率以文员领之”。④ 这些“文员”，大都出身清寒的知识分子。所以，湘军是一支从地主阶级基层崛起的政治集团所掌握的军队。

正是因为湘军的政治基础与原先的军队不同，曾国藩可以深谋远虑，采取不同的战略方针。他一再握绝了清廷急功近利的用兵方针，不爭一时一地之得失，始终坚持“扼金陵之上游”⑤的方略，

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3，第37页。

②同上，卷5，第34页。

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56页。

④王 运：《湘军志》第5页，岳 书社1983年版。

⑤《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第25页。

稳扎稳打，从力争武昌、九江、安庆等上游战略要地，向太平军的首都天京步步紧逼，从而使湘军从一支微不足道的地方团练武装，发展为清军主力，并且达到了消灭太平军的战略目的。

尽管捻军与太平军的作战方法不同，但清廷依靠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尾追兜击的战略方针，同样遭到失败。不能不依靠熟悉捻军的由两淮团练武装发展起来的淮军为主力。淮军统帅李鸿章采取了“弃一隅以诱之”，“见地兜围”^①的战略方针，才歼杀了捻军流动作战的优势，暴露了捻军无根据地作战的弱点，最后达到了消灭捻军的战略目的。李鸿章的这种作战方针，是僧格林沁所不可能实施的。因为，僧格林沁指挥的蒙古骑兵虽然是有战斗力的，但是，僧格林沁与基层地主阶级缺少联系，不懂如何去强化地主阶级的基层统治，因而不能歼杀捻军流动作战的活力，也就不能与捻军争胜，落得个军溃身亡的下场。

在镇压资产阶级革命的历次战争中，执政的统治集团，对政治关系的调度能力，即协调统治集团、中间派、革命派之间同盟分合关系的能力，是影响战略形势的关键。

在统淮集团方面，辛亥革命的时候，清廷在各地的统治土崩瓦解，执掌军政大权的满族亲贵早已丧失了政治调度的能力，他们甚至难以调动和指挥北洋军队南下镇压革命。然而，被清廷罢黜乡居的袁世凯，作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

^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1，第48—49页。

主要继承人和政治代表，作为北洋新建陆军的创建人，他得到列强和北洋军人的支持，因而拥有协调统治集团的政治调度能力。但是，袁世凯为了甩掉清廷这个包袱，养敌自重。他在出山前，对带兵南下的北洋部将冯国璋“授以‘慢慢走，等等看’六字要诀”^①。他从清廷手中获得军政大权之后，羽毛未丰，于革命军以适度的打击之后，即宣布停战议和，不作长期战争的部署，仅在北方几省用兵，以巩固其在京畿核心地区的统治。

二次革命时则不同，袁世凯牢牢地掌握着中央政权和北洋军队，并且整补充实了军力，北洋各军指挥统一，士气高昂。这样，袁世凯能够集中北洋精锐与讨袁军展开战略决战。

然而，护国战争爆发时，袁世凯帝制自为，使北洋集团离心离德。尽管北洋军队的势力在二次革命后深入南方各地，大肆扩充，进入了颠峰时期，然而袁世凯进行战争动员，碰上了重重困难。他勉强集结起优势的兵力，自四川、湘西进兵征滇，但士气低落，战斗不利，只能与敌相持，难以有所进取。奉命出征的前线司令官曹錕逗留岳州，未尝一临前敌。这样，袁世凯就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

对于中间势力，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前关于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和举办新政的实绩，赢得了中间势力的同情。辛亥革命时，袁世凯以停战议和的策略，把转向革命阵营的中间势力争取到了自己的一

^①陶菊隐：《六君子传》第46页，1946年中华书局印行。

边。黎元洪、张謇等在革命阵营内部制造了“非袁莫属”的政治气氛。中间派影响下的军队“要求非和不可，并暗与袁通气。”^①这就改善了清军原先四面被攻，比较孤立的战略态势。

到二次革命时，袁世凯在民初政潮中，扩大了与黎元洪、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的联盟。战争期间，袁世凯又让进步党人熊希龄组织内阁。因此，当时多数地方势力支持袁世凯，而黎元洪控制下的湖北，竟成了北洋军队的前进基地。这就使北洋军队在战斗中，没有后顾之忧。

然而，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把进步党人一脚踏开，独揽了政权。而洪宪帝制，使他同中间派的联盟完全破裂，迫使一向不主张暴力革命的中间派，倾向武力倒袁。梁启超、蔡锷策动云南发动了护国战争。于是，袁世凯的战略态势严重恶化，随着各地独立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孤立的袁世凯被迫要求停战议和，宣告了镇压护国运动的战略失败。

对于革命党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以和战而手的策略，赢得了主动。他出山后即赴湖北前线，部署军事，以优势兵力夺取汉口、汉阳，取得战略优势后，即以政治手段诱使革命党人放弃武装斗争。他通过与中间派的默契，使一批革命党人，如著名革命党领袖章太炎，湖北军务部长孙武，浙军将领朱瑞等，与中间派合作拥袁，从而削弱了革命党人中主战派的力量。袁世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

^①政轶：《辛亥广面援鄂回忆录》，《辛亥革命资料》第483页。

效忠共和制度的欺骗性政治誓言，消弭了革命。

在二次革命发动之前，袁世凯虽然早已作好武力摧毁革命势力的准备，但他仍然力图以和平手段消弭革命。他依靠进步党人的配合，继续信誓旦旦，效忠共和，诱使革命党人陷入法律解决、政治解决的幻觉之中，使孙中山的革命发动屡遭挫折。同时，袁世凯对革命派将领进行了广泛的策反工作，严重动摇了革命党人的军心，一批革命派将领甚至公开投敌。最后，他乘革命党人对起兵严重动摇之机，派遣精兵深入革命党人的政治——军事腹心地区，进行战略压制和战略分割，从而确保了北洋军的战略优势，迅速地镇压了二次革命。

待到护国战争时，袁世凯明目张胆地复辟帝制，使他最终丧失了政治欺骗的能力。他不但不能再用政治手段去分化、瓦解革命党人，反而促使了分裂为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的革命党人趋于团结，并且，革命党人和梁启超、蔡锷一系的护国军派之间，也建立了松懈的反袁联盟。袁世凯再也无法用政治欺骗的手段使革命党人放弃武装斗争。

袁世凯丧失了政治调度的能力，战略形势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治上的孤立，使他忧急致病而死，他的政治、军事遗产，只好传给了拥有政治调度能力的段祺瑞。

由于革命党人的战争的直接目的有限，战争双方之间，政治上具有妥协性，战争动机比较弱，运用暴力手段不彻底，战争不具有绝对性。因此，镇压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政治调度能力，直接影